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一五期 ——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9b)

【口述历史】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上)	唐欣·米鹤都·墨诞
【春秋史笔】	折戟沉沙日,长忆“九一三”——林彪与谄谀	启之
【史海钩沉】	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	郑彦英
【荒诞年代】	文革最红最红的红歌:《完蛋歌》	心里有杆秤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口述历史】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上)

采写:唐欣、米鹤都·编辑:墨诞、米鹤都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米鹤都所撰《编者的话》见本刊 zk1102c: <http://museums.cnd.org/CR/ZK11/cr619.gb.html#1>)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古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

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 中农+中农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秦家日子好过些，但也欠了不少钱，赶上国民党时期通胀，票子不值钱，把欠的账都还了，土改时就划为了中农。我爸爸说，如果当年不到秦家，如果没有通胀，我家肯定比贫农还贫，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嘛。我妈妈家相反，是陕北佳县一个世家，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不过到了我姥爷那一代开始衰落。我几个舅舅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三舅阎揆要（1）就是黄埔一期的。他们认为知识重要，所以包括女孩子都要上学，我妈妈也就去勤工俭学。虽然我妈妈出身大户人家，到土改时也破落成了中农，最后父母两家在中农那里划等号了。

我爸爸叫秦力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呆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1936年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我妈妈叫阎佑西，1937年“七七事变”前去陕北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去的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军队检查，查出地下党给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郭洪涛的一封介绍信。他们说，郭洪涛可是大共产党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妈妈还是小孩，特老实。他们又一翻，翻出一封给我舅舅的信。我舅舅当时由组织安排在杨虎城部队里当团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检查的人见是阎揆要的妹子，赶快停止了搜查，还给我妈敬了个礼。我舅舅知道后就派了辆汽车把我妈接走了，住在他家里。我妈老是心急，要走。我舅舅说，天下雨，你根本走不了，多住两天。那次下了足有一个月的雨，我妈最后还是坚决走了。这样到延安的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妈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没算上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后来，我们和她开玩笑，是老天爷没让你参加土地革命。

我爸爸虽然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后，他的经历、共事的人都不在山西圈子里，像薄一波他们搞的决死纵队、牺盟会等，他都没有参与过。他主要在陕北苏区的圈子里，陕北的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我爸爸都特别熟。我爸爸到陕北时，正赶上朱理治他们来了，把刘志丹抓起来了，我爸爸也被抓起来了。把坑都挖好了，要活埋他们，恰好中央红军到了，给制止了。

我妈跟我爸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与马文瑞有点关系。有个周末，马文瑞叫我爸爸跟他去走走。我爸问，去哪啊？他说，去陕北公学。我爸问，去陕北公学干什么？马文瑞是找邵式平（2）有事，却对我爸说，讨老婆去嘛。我爸说，你不有老婆了吗（马文瑞和孙铭是经我爸爸撮合成婚的）？马文瑞说，你不是还没老婆嘛。我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跟着去了。我妈当时是陕北公学一期的学生，周末没上课，正站在院子里。马文瑞与我妈很熟，就招呼我妈说，你带我们去找邵式平。这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我妈妈后来说，她当时看见我爸了，但印象不深。我们后来也没问过我爸爸，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化学反映了。等我爸爸后来到富县当县委书记时候，我妈妈也分配到富县工作，才算真正认识。他们是1938年在富县结的婚，结婚时送了尤香斋（曾先后与谢子长、阎红彦结婚）一张结婚照。1993年我父亲去世时她把这张一直保存着的照片送还给了我妈妈。

我哥和我姐都是在延安生的。我是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在妈妈肚子里撤到了山西，4月出生在山西离石359旅的医院。当时我爸爸是晋绥三地委书记，跟359旅旅部驻地在一起。生我的时候，王震夫人王季青阿姨还给我妈妈送来一百个鸡蛋。我跟山西有缘，不仅老家是山西，我也出生在山西，上工农兵大学时又跑到了山西，后来还在山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实，我自己在山西并没怎么呆过。

我是吃我妈奶长大的。我哥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那保姆长得黑黑的，我哥哥脸也黑黑的。高岗就开玩笑，说他是吃保姆的奶吃黑的。我姐比我大一岁半，没吃两天我妈的奶，就让给我吃了。那时拴了只羊，给我姐喂羊奶吃。1949年父母先随部队南下进川。那时，西康是一个省，我爸爸到西康后，整个晋绥三分区地委就变成西康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只有书记廖志高是中央派来的，我爸爸任省委副书记。我妹妹就生在雅安，后来弟弟生在北京。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家说我妈会生，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我就更幸运了，哥、姐、弟、妹一样一个，全齐了。

我是1950年初到西康雅安的，在那里呆了两年。我那时已经记事了，记得那时爱吃麻糖、醪糟。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牵着我和我姐姐的手，一进省委大院的门，哨兵咔嚓一个立正敬礼。当时，我和我姐不肯去幼儿园，廖志高家的孩子和刘忠司令员的孩子也不肯去，怎么办呢，就在省委机关大院搞了个幼儿园，还布置有玩具、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幼儿园园长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吃饭也打个铃什么的。

◇ 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1952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我被送到位于西山的六一幼儿园。那是个干部子弟幼儿园，条件很好，寄宿制。幼儿园出来后，上了培英小学。那时候，北京有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培英、华北育才、育英、育才等。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华北育才和培英被撤销了，我被并入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行军2000里走到北京。（下略）

◇ 政治意识的萌动

育才的学生分两个不同的群体，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全部是干部子弟，到后来就对周围的居民开放招生了。学校周围是宣武区的居民，这些学生不住校。这时，不同家庭背景的文化冲突就开始显现出来。有一个走读生，梳着个涂了油的分头，他一进学校，就一直被我们这些同学起哄，搞得他最后都没地儿呆了。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个发型是资产阶级的，跟我们不是一种人。走读生穿衣服也很垮，还有穿缙裆裤的。我们看见了就笑话他们。他们说话也都是北京土话，我们就拿他们的话调侃。后来，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们后来才了解，当年满人进京以后，就把汉人都给赶到南城来了。汉人住的地方条件很差，但凡有点本事的汉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底层的贫民。我去过那些同学的家里，胡同里都是非常破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就像贫民窟似的，车进不去，外观也很差，但是屋里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说起这些事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育才学校开始办初中部。本来要考四中，经学校动员上了育才第一届初中。上初中以后，逐渐成熟点了，不再按照生活方式、出身去划分人了，学会了按照好学生、差学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不要求进步；是团员、不是团员，这样来划分了。两批出身不同的学生之间隔阂也就越来越小，到后来，我们彼此还成了朋友。

初中时期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知道实际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大家都吃不饱饭。那时那个饿呀，至今印象深刻。为了减少体力的消耗，学校也不组织那么多活动了，体育课也取消了，会也开得少了。那时，一斤粮票能买五斤红薯，还觉得挺值。换成五斤红薯就吃红薯粥，觉得挺过瘾，结果五斤红薯真不抵一斤粮食，一会儿就饿了，饿得很难受。当时，给学生发机动粮，比如说一个人定量二十八斤粮食，其中有两、三斤是机动粮。在学校食堂吃完份饭后，只要你愿意，撕张机动粮票给食堂就可以再得到点食物。照现在看，粮食定量也不算少，可是，那时由于没有一点油水，这些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会儿，我们吃完饭就一件事，

算计算计要不要吃点机动粮。不计算的话，机动粮早就吃没了，所以，你得计算好了匀着来吃。我们经常都是买半个馒头。当时觉得世界上没有比馒头再好吃的东西了，那么白、那么暄、那么甜。

在学校里，我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初中二年级就入团了，一个班上大概也就三、五个团员，我是团支部委员。其实，孩子王有两类，像我们这种是尚文的，学习成绩不错，平常为人也可以。我在育才的学习是属于超一流的。初中三年的课程，除了音乐、美术这两科不是优以外，剩下全都是五分或叫优。而尚武的，是另一种人了。虽称“出将入相”，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文比武高一等。初中时我就看我爸的《参考资料》了，父母也让我看。我从中了解了不少国际和国家大事。当时最爱看的就是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好。比如中国试验了原子弹，外国如何报道。看那些东西特别过瘾，能滋生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参考资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就很多。今天看，其实那大多是些非主流媒体的声音，并不具有权威性。我哥哥是北大中文系学古典文学的，受他影响我也看点文学类的书。那时候出版了一批小说，《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还有不少苏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小孩——老鬼，就是我的同学，还有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的小孩，我们学校有好多这种人，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书看得多了，知识面就更广了，这样就在同学中有影响力，大家都愿意围着我。

学雷锋是初中时的事情，也是属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没有很刻意地上街帮人做好事，好像也干过，但没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们也关心政治，记得当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原子弹试验成功，还有一个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苏论战。我记得我们全家都坐着静悄悄地听播送《九评》。在我的意识里，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也有极大的激励。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的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在育才所受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主义教育，此外，还灌输一个强烈的意识：你是革命的后代、是接班人。对我来讲，长期住校，学校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没有其它的渠道。育才学校无形中让你有一种压力，那就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上的切割是很成功的，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时都以炫耀、显摆自己家怎么怎么样为耻。如果从家里带点吃的到学校，从来都是大家分着吃，不搞特殊化。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将来比别人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接班，接父辈事业的班。

育才的这批学生，今天看，整体上人品都是很好的，没有特别追逐官啊、利啊的，一般人日子过得很平淡，干的是本本分分的事。同学之间现在还有联系，每年我们聚一次，经常是找些很低档的餐馆聚聚。其实，找个高档地方吃顿饭对大家也不是什么事，可他们都说这样挺好。这也是育才朴实的校风培育的结果。

◇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那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

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余靖是1965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1966年2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 of 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级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点名了，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7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傅洋、傅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傅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成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带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煊，他是高一年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绌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 近观毛泽东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站在金水桥前面维持秩序。头一天晚上都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中待命，第二天一早就站到金水桥前面去了。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准备。后来，有些还不是首领的人也上去了，队伍里好像很多人都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有上去，我们就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照了像。我们在旁边，总理在中间。金水桥那么长的一溜，总理就一段、一段地跟我们照相。后来，我是跑到新华社要的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照片呢。

“八·三一”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刚走下天安门，有一个外地学生拦主席座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任，威胁了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个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是从八一学校来四中的。以前上课经常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老师说，你讲得什么呀？我都听不懂，把老师倒给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争执中，他顶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

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成“英雄”了。

我是“九·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上的天安门。我记得上天安门的时候，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去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毛主席走过来的时候，举着手看着我们。当时，我们离得很近，见到主席很激动，欢呼声很大，但秩序还好。不过，我看到主席目光是一个不很喜欢我们的目光。我当时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感觉，就感到主席不喜欢，或者是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就那样地看着我们。面对这么疯狂的场面，我觉得他也担忧了。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我的这个感觉。

第二件事就是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头，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俩的长谈主要是主席讲，刘听。主席讲的时候还打手势，像是个认真的谈话，超出了在这种场合上谈话的时间。而且，回想起来很奇怪，主席怎么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还谈那么长时间的话？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 我知道的“西纠”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西纠”的成立有这么个背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就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写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红卫兵一下子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当时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头去搞“破四旧”，而是希望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成立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经关闭了。成立宣言上把西城几乎所有的中学名字都写上了。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也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所以经常是一帮子人，一窝风似的到我们家去。我妈妈是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住下两个“连”的人，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10个《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写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了，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就负责组织人员去行动。记得“西纠”在地质部跟地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长时间，使地质部免于受到冲击，也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象西方一位哲人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了某种权威。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送啊？于是反映给我们。“西纠”就发了第一号《通令》，说《毛选》可以卖。那时，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抄家的方式我们是不主张的，所以，专门发了道《通令》去规范。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一些红卫兵就把他们都给赶到北京火车站了。而原籍所在地不接受，北京也不接受，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混乱一片。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的人跑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这事。

关于《通令》的内容，我们是一起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是比较重要的《通令》。当时，李三友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经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写得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写了两个。六中当时办了一个“红卫兵报”，我们就想收编它，谈的时候很难缠，不过报纸最后还是被我们收过来了，成为“西纠”的机关报了。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抄家、打人这类事情。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以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大会声讨。这个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地押到台前。会场气氛很激烈，有人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给人的直接信号就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候，街头上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他们还以为地盘是他的。以后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会议。

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叶帅（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妈妈，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总理了。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这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的费用，都是由国务院给配的。

“西纠”也就存在三、两个月吧。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总理帮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串联去了。我们走了以后，“西纠”总部剩下几个留守的人，也不是正式委任的。陈伯达有次带人到“西纠”总部来了。听说陈伯达当时挨个问他们的父母都是谁，当时，有人属于比较冲的，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地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就呛起来了。陈伯达后来就提出来要看“西纠”用刑的地方，“西纠”哪有这种地方呀？六中打人的事，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所以，两边就呛得更厉害了。之后，他们就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是因为“西纠”的原因被抓，对“西纠”其他的人没有抓。我串联回来时，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一个总理在场的活动，开摩托车的人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要从政治上考虑，保护总理，就没再说什么。慢慢地，才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不是要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主张讲政策。面对红卫兵中出现的越来越不讲政策的现象，我们也感到担忧。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起来后，必定会出现这种现象，觉得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里，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因为，红卫兵纠察队毕竟是那四、五十个学校共同认同的组织。但是，中央文革认为“西纠”有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就硬是把我们给搞垮了。

◇ 为混乱担忧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的领导层集体辞职，之后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到大连，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还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几个人正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就从上海返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经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的。当然，也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人，而且，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那时对毛主席还是相信的、迷信的，不可能去挑战毛主席。但是，对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了，把江青弄出来，却不能接受。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走资派”是从内心有抵触的，可是，并不一定表现得那么自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只是打击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了，也不只是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了。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去煽风、点火，就是去了解情况、看一看。我第二次出去串联是和孔丹一起去的，那次去是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先去广州，一路我们了解到两件事：一件事是，广州八一学校的一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当时干部子弟被冷落了、被打压了，所以他们变得很消极，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还有一件事是，像四川、湖南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人组织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和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张延忠，张鼎丞之女）说，九九就跟选宁（叶剑英之子）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管会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有目的地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情，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队”的苏晓前——苏静（中将，时任总参军务部长）的儿子、赖锐锐——赖际发（时任建材部长）的儿子、孙茜玲——孙大光（时任交通部长）的女儿在一起开会的事，都记录在案了。“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是很严重的。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的时候还能够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家和群众中间威望很高。后来院党组就控制不了局面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的地方。张劲夫没地方呆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议。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也没做出什么决议来，大家都是在谈情况。但是，这就跟一般的会不一样了，成了秘密会议、黑会。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中央文革想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保张劲夫很难了，可又要把控制权给保住，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包括党组成员：张、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郁（文）这些人。随后，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来做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在和中央文革的斗争中也是能拿一块是一块。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还有国家那些大的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啦，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没有被抓，只是隔离审查。这事出来后，从我爸爸到我们全家从来没有怨恨过总理。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是抄家，然后是扫地出门。搬家的时候，我正在外地串联呢，是家里几个孩子和一帮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家。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我爸妈一间。我妈妈是睡在柜子上的，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陈毅之子）谈恋爱的时候，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也不是要看我们家怎么样，只是表示她应该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还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出来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总理也知道我爸爸出来了，

有次开会时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就站起来了。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也是心知肚明。

◇ 从质疑到抗争

1966年底的时候，我就在想，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在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这么个观点：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后来，我就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是，开小会的时候，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的时候，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变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年，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会。当时，老红卫兵已经被排挤了，但还没有完全死掉，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括联动也是折腾。那次会上，我上台讲了话，是我、王向荣、戴晓明三个人上去讲的，我们提到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底下跟疯了一样，哗的一片掌声，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

那个时候，老红卫兵中间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对毛那个时候依靠江青在那里折腾，把社会搞得那么乱，整了那么多人，肯定是不理解。其实心里很明白，但对毛还有幻想，也是自己骗自己吧。

1967年上半年，孔丹被放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很理性地去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去了。我们认为中国这事是让中央文革搞坏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那么深，也没想直接去质疑毛。后来，我们就办了个小报，起名《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去调查。第一篇社论是孔丹主笔的，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很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现在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文革中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都没有反省，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那天，正好是学校副校长在广播室播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孔丹主讲，刚开始讲，就被他们掐断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管会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是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江青的，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抓孔丹的时候挺戏剧性的。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跟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他长得瘦瘦的，像个螳螂样。他进来一看，本来奔着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这里，一下紧张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

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那个院子是个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人听到有人正在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赶紧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然后，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管会决定对我拘留，还搜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的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要经受铁窗烈火、带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升。我以为会把我往囚车上一押，我那感觉就出来了。结果出门一看：没车？我还想，怎么没车呀？结果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了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白显英雄气概了。

李三友被关进来，他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我一听就知道三友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人：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煊。我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没过两天，我们就把口风串好了。孔丹有经验，我们心里也没觉得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认为我们是正义的，所以也不怕他们。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开始互相串供。关我的那个屋子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后，用手指了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把那个纸条拿出来看。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面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没有这些事。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了一首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的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的时候一个人给你的，你就抄下来了，那个人你也不认识，那诗也看不懂。反正，我们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承认。就这样大概关了有两个多月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还是不允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我们也没理睬他们，后来就自己去内蒙插队了。

（未完待续）

~~~~~

## 【春秋史笔】

折戟沉沙日，长忆“九一三”——林彪与谄谀

· 启 之 ·

（启之，中国电影研究艺术中心研究员。“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9岁，正在内蒙插队。）

一、

林彪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内蒙土旗插队。队长二银虎病下了，我这个记工员更没法歇，整天领着三四十号社员苦受。前晌东坟地，后晌马莲滩，谷子、玉茭子、糖菜、胡麻，地里的活儿没完没了。晚上回来，查工分的社员挤了半屋子。把他们打发走了，一头倒下，死一般地睡。那时候，你就是一头牲口，帝力于牲口何有哉！

我何时，何处，从何人那里听说林彪的事，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就连当时必有的惊骇，在头脑间也不留一丝痕迹。那些年，经历的国家大事太多，不免麻木不仁——彭罗陆杨、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二月逆流、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昨天是高官显贵，今天就被砸烂狗头。死上一两个副统帅，也见怪不怪了。再说了，不管怎么天地翻覆，明天我还得领着人下地。

能说话的知青都回北京了，当地的农民成了我的讨论对象。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村里的知

识分子程天正来我这儿，我按最高规格招待——递给他一支太阳烟。他接过来，夹在耳朵上，上炕盘腿，拉过炕头的塑料袋，捏起一撮黄楞楞的烟叶子，一边卷，一边说：“林彪死了，知青政策可能有变化。”“哼，你就灰撒（内蒙方言：胡说）吧！”我说。

## 二、

一个月以后，他的灰撒成了现实——内蒙工业局到土旗招工，我被内蒙铸锻厂挑中。

告别塔布赛时，天正请我到他家吃饺子。吃完了，他从大红躺柜的深处，翻出一个木盒子，盒子里装着照片、奖状、私信、公函——他原来是内蒙水泥厂的团委书记，1960年厂子下马，他回乡务农。因为地主出身，原来的女友分手了。三十大几，才有一个从察哈尔逃荒来的丑女子嫁给他。

天正一样一样地给我看，最后从这些“细软”的下面，翻出了一本破旧的《封神演义》。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他大概是用这本珍藏的读物，偿还他欠我的钱——两年多前，他的女娃发高烧，送公社看病没钱，我给了他十块钱。

带着这本书，我到了铸锻厂铸铁车间，成了混沙组的一个熟练工。

成了工人阶级之后，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在政治学习会上，给大伙念“571工程纪要”。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念完了，我不禁对林彪父子暗生敬意——他们说得多好啊！

敬意之外，还有一点儿不可告人的猜测——是不是中央要消除知青“变相劳改”的恶劣影响，我才有幸当上了工人？

## 三、

批林批孔使我有读了史的机会，范文澜的通史就是那时候看的。《封神演义》也就在这种名义下翻了一遍。我对神魔小说不感兴趣，但也不免有些联想——看到商纣王的暴虐，不知不觉与B—52（毛泽东）对起号来，而《纪要》对毛的评价更让人想入非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再思谋起来，我又不免佩服起主席来——敢于将如此恶毒的诅咒发下来，足以证明其胸襟气度。

但是，最让我佩服的还是571的作者——据李伟信交代，《纪要》是“于新野按照林彪、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在某三天内（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写的。《纪要》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说中国的国家机器是个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真是字字见血、句句入骨。尤其是那个“绞肉机”的比喻让我铭心刻骨——十八年后，我把它写进了《内蒙文革实录》。

邱会作说，毛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让汪东兴告诉政治局，“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还和汪碰了杯。（《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86、788、798页）。几天后，毛的轻松快活变成了僵卧长愁——整天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和做事。一下子苍老许多，背驼了，腿也不听使唤了。腿脚浮肿，肺部发炎，浓痰不断。弄得他夜不能寐，只剩下咳嗽。（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毛的病源于心，他醒悟过来——他固然可以把“二月逆流”、“乱党乱军”等等一大堆屎盆子都扣在林彪头上。但是，林彪也用他的死揭了毛的老底——副统帅、亲密战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居然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这意味他这位“英明领袖”不过是个饭桶、骗子、教唆犯。

#### 四、

国人对文革的投入和信任，基于对毛的迷信和崇拜。林彪的一腔污血，被历史之手一滴不剩地泼到了毛的身上，令其灵光大减，文革的基础从此动摇。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而独立思考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会沿着因果逻辑铺设的轨道疾驰。毛这个神一倒，1966年以来被官方肯定的一切，就会随之倒下。

因环境、禀赋的不同，人们对文革的觉悟有迟有早，林昭，北大右派学生，在文革伊始，就看出这是毛在祸国殃民。徐明曜，前北大数学系教授。当时在唐山当中学老师。红卫兵一起来，他就觉察到了这运动的荒谬。马德波，前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副厂长，刘少奇一被打倒，他就认定这场运动不过是争权夺利。清华的武斗，更让好些人重新思考这场革命。但是，真正让民众怀疑毛，怀疑文革的是“九一三”。应该说，林彪之死是国人大面积觉悟的开始。它为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开辟了道路，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添砖加瓦。

我属于后知后觉者，直到1972年初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的附录里看到《571工程纪要》，才悟出这个世道不对头。我的几位四中同窗，就是从那时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阶级和政治经济学的。

尽管林氏对他所抨击的暴政贡献多多，且这个《纪要》也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借口，而绝无救民于水火之诚心。但是，我还是要借此机会，向文革思想史的作者献上一个郑重的建议：请您在大作中为《纪要》写上一笔。

#### 五、

想到林彪的赫赫战功，想到他的灭门之灾，想到他对毛的忠心赤胆，想到他成了毛的替罪羊，有些人不禁热血沸腾，为他鸣冤叫屈。

王年一，文革研究的著名学者，我尊敬的前辈，给舒云的《林彪画传》写序，称林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有着“爱国家、爱人民的伟大人格”，而他“读这本书的过程，是感动的过程，是受教育的过程，是与伟人亲密接触的过程。”（《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喜读舒云的新著〈林彪画传〉》。载《王年一文集》。编者——见本刊 z k 0 7 0 9 a）我不以为然，提醒王先生：林彪吹毛，坏了一代风气。王先生以林之功、之冤反驳我。说着说着，不禁涕泪涟涟。

从王到舒，从内到外，为林彪翻案的人不少。一位朋友给我写信，痛陈林彪之冤。并引了1951年胡风给牛汉信中的一句话：“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他认为：“这话用在林彪身上很合适。”

我为有这么一位糊涂的朋友欣然，于是建议他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写一篇《林彪与胡风异同论》。事过七年，他仍没写出来。

据我看，除了尊毛爱党之外，林彪与胡风完全是不共戴天的两类人。林彪看准的不是“脏臭的铁壁”，而是一个反复无常，以整人为乐的皇帝。林彪从来不想掷出他的头颅，他只是不想向毛低下他的头而已——庐山会议后，毛先搞“批陈整风”、再反黄吴李邱的“军事俱乐部”。“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步步围攻，实际上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李作鹏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81页）但是，林彪自恃功劳盖世，坚持“三不主义”：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他知道，检讨不检讨都一样。林彪的死扛，在四十年后，获得了其“死党”的高度评价——“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邓小平多次检讨，表态‘永不翻案’，站起来之后不久，又强加‘走资派还在走’的罪名，被打倒了。……黄吴李邱检讨多次，中央通过毛也通过了，最后还是被打倒。（出处同上）——他为毛立下了汗马之功，有资格向毛说“不”！

是的，林彪那颗烧焦的头颅确实给那个“脏臭的铁壁”砸开了一个大洞。但是，他既非慷慨赴死的英雄，也不是反抗暴政的勇士。是的，林在文革之中当过观潮派、逍遥派；他的出逃的确是毛逼出来的。（见王年一《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王年一文集》。编者——见本刊zk0409d，zk0403c）考虑到九届二中全会的表现，我们还应该说，林彪还抵制过毛、抵制过文革。但是，有两件事明摆着，第一，没有林彪的支持，文革发动不起来。第二，在“造神运动”中，林彪功劳第一。

## 六、

林彪用他的谄谀与冤屈给人们出了一个难题。以至于有些史学家举臀踟躇，踟躇犹豫之中，不免坐错了地方。随便举个例子——

澳大利亚墨纳斯大学（Monash University）教授，与 Frederick C. Teiwes 合著过《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一书的 Warren Sun 先生，说林有三大冤。其二是：“林彪尽管骨子里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鉴于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后仍落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载《明报》月刊1996年7月号。编者——见本刊zk9709a）

这里的逻辑是，林对得起毛，毛对不起林。换句话说，既然林“处心积虑”地拍毛之马屁，他就不应该身败名裂。如果身败名裂，就是不义不公，就是冤比窦娥。

Sun 先生的屁股坐在哪儿了？是坐在毛家湾的沙发上？还是坐在了怀仁堂的门槛上？

什么叫冤？无故受到指责，无罪说成有罪，是为冤。林彪没反党，更没反革命，也没证据说他谋害毛，可非要这样说，那是冤，冤得很。

林彪吹毛、造神、搞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将谄谀之风从党内刮向了社会，坏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如果按照败坏风气罪判林彪，不冤。

林彪的问题是罪非所罚，罚非其罪。他本来是在道德上犯了罪，却非说他是政治犯。就好比是一人组织卖淫，却判他颠覆国家。生产毒牛奶，却定他里通外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逼供为根据，以需要为准绳。势必要造成这种罪与罚的错位。

七、

人欲辱之，必先自辱。林彪遭此不测之灾，蒙受替罪之冤，有一半是他自找。

毛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林彪一生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挺毛。林的两件事跟毛的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没有林的力战，毛不易打败蒋介石。没有林的力挺，毛搞不起文革。

为林鸣冤叫屈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林彪挺毛的手段和恶果。

林彪挺毛之法，一言以蔽之：投其所好。林知道，毛爱听好话。而林认为，作为毛的嫡系和亲密战友，他有义务有责任满足主席这个低级趣味。

从1959年当上国防部长，林就致力于此。其最杰出的表现是七千人大会。当时刘少奇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大窘，提出重写报告。在刘亚楼、陶铸等人的鼓动下，林彪站出来挺毛（《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545页）：“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突出优点是……不脱离实际。”“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李德、舒云编著《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第827页）

本来是毛脱离实际，林偏偏说毛不脱离实际。本来是听了毛的话才造成三年困难，林彪偏偏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没听毛的话。林彪用他的言传身教告诉中共的官员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胡吹乱捧，谄媚阿谀才是英雄好汉！

高文谦说林彪“生性孤傲”，“个性极强、从不服软。”（《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323、335页）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他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谄谀。在中国官场上，“谄谀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的哲人就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意思是“迎合对方顺引话意，叫做谄；不辨是非巴结奉承，叫做谀。”（《庄子·渔夫》，百度百科）林彪具备了谄谀者的全部素养和本领，从出山到摔死，12年间，他有11年半像李林甫一样迎合上意，像李莲英一样阿谀取容。

毛投桃报李：林要求军队学毛著，毛就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林支持毛搞文革，毛就把他定为接班人，还假模假样地写进了党章。

八、

《林副主席语录》正文380页，其中充满了对毛的谀辞和谀赞。《林彪日记》（李德、舒云编）中的林彪讲话，则以更完整、更有条理的方式重复着这些内容。我在这本书中划了无数的道道，一个大疑问盘踞不去：林彪为什么要如此肉麻地吹捧毛？

在吴李邱写的回忆录中，以及邱父子的心灵对话中，除了吴法宪略有提及之外，其他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何必如此？

我请教郑仲兵先生。郑说，林吹毛，是为了山头——中共党内分了几个山头，毛是林这个山头上的老大。林彪是军事家，知道要战胜对手，就得保住自己的山头。而保住山头，首先得



保住老大。这里有感情，有义气，也有为臣之道。

但是，这个解释仍不能解我心头之困——当“山头”已经稳如泰山了，你林彪干吗还要肉麻个没完没了？拍马逢迎者，一定有所图。而林彪并无所图——他身体不好，又无野心，且位极人臣，何必还要自轻自贱继续阿谀取容？

韩刚有句话很到位：林彪是“过度自我保护”。也就是说，林彪是为了自保而防卫过度。

在官场上，你要是不跟同事、上级一道吃喝嫖赌、贪污受贿，你的官就当不长。在黑道里，你要是不跟着同伙们一起作奸犯科，杀人放火贩毒，你的小命就难保。在政治运动中，你要是不承认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革命群众就把你往死里整。自古以来，自污都是自保的一个重要手段。林彪为了自保而拍马，与官员们为了自保而贪污，黑手党为了自保而杀人，文化人为了自保而认罪，一个道理。

顺着这个思路，我揣摩林彪的心理：彭德怀倒了，因为顶撞毛；刘少奇完了，因为跟得不紧。我来个恭顺紧跟，你划圈我划圈，你说东我不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拍马逢迎，只求自保。

如果一个时代，从中央领导到底层百姓，只能用自污才能自保，那么，这是个什么世道？

九、

在我会唱的“红歌”之中，“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唱得最好：“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在唱它，是滑稽，是反讽，是黑色幽默。可想当初，一旦那雄壮庄严的曲调在耳边响起，一种崇高感就会在我心中升腾。我相信，当这歌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有无数人会像我一样被这阳刚之美所感动。

那么，林彪，这首歌的词作者，有这种崇高感吗？换言之，他的阿谀逢迎是发自肺腑，还是发自皮肤？

1970年下半年，在拍马受挫之后，林彪对家人吐露了真言：“今后再也不能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作者注）就是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14页）解读林彪的上述真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他知道自己以前的讲话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不愿意承认阿谀逢迎，而以“随便讲话”代之。第二，他知道毛最喜欢吹捧，最不喜欢讲老实话，而他以前不讲老实话，就是为了自保。第三，他的反思和不满是因为好心没得好报。如果毛在批陈整风中不再揪住他和黄吴李邱，而是高抬贵手，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好心得毛的好报，那么，他还会接着说那些没有根据的，不老实的话，继续吹捧下去。

据高文谦分析，《571工程纪要》的“主要思想显然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有反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那种感觉。”（《晚年周恩来》，第321—322页）这种分析有相当的道理。我还可以补充一些推理性的证据：《纪要》中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

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这种说法，很像是林彪在为自己的吹毛做解释，找台阶。

如果林彪确是《纪要》主要思想的提供者，那么，他政治做秀的功夫绝对是天下第一。有史以来，有谁能像林彪一样把两面派演得如此出神入化——会上吹毛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会下说他是秦始皇、法西斯？在媒体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唱颂歌，回到家里咬牙切齿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林彪出事之后，主流媒体大力宣传的文字。事实上，这后两句用在毛泽东身上更合适。至于林彪，说他“当面说好话，背后吐真言”似乎更为惬意。

十、

听说林彪摔死，邓小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在这个天理之中，应该包括对谄媚的憎恶。可是，两天后，邓小平给毛写信，也还是得写上“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节，朴方的遭遇3）

对于邓小平的这些“谰词”，邓榕做了自相矛盾的解释：“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在保持人格、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和气节的前提下，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作自我批评。”邓榕差矣：你可以把说违心的话归为政治家的策略。但请勿扯上道德操守——违心者，岂有原则、气节、人格可言？

邓小平的困境，是中共的困境——1943年3月20日，中共高层作茧自缚，赋予了毛“最后决定之权”。1958年3月，毛为独揽大权，悍然推翻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以正确崇拜与错误崇拜的诡辩，混淆是非，大力推崇对他本人的崇拜。“参加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252页）八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更是带头吹毛，刘少奇称“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柯庆施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同上，第252页）周恩来称：“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同上，第332页）。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带头，地方影从。从此，谄媚之风日盛。一个以反独裁，要民主起家，以解放全人类自许，发誓带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政党，居然搞起了吹拍比赛。大家比着吹，看谁吹得好。比来比去，林彪胜出——在谄媚上，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无疑是最最最杰出、最最最有创造性的一个。说他杰出，是因为他有言论，更有行动，说他有创造性，是因为他有一套别人想不到的方法和措施，他把吹毛变成了一个由军队发起，中央领导、政府响应，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

十一、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可以说是这项工程的奠基礼。其重大意义，周恩来说得清楚：（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九大上的讲话，《邱会作回忆录》，第623页）

这段话从反面证明了林彪吹毛——出版《毛主席语录》与文革的关系：第一，用毛“思想武装了亿万群众”，是文革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第二，因此，为文革做了“最有力的舆论动员”。

“小红书”首先武装的是军队。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做的最大最持久最有成效，而与军事最无关的一件事，就是把军队变成一所学习毛思想的大学校——确切地说，是一所造神的学校，一所以宣传现代迷信为主业的学校，一个极左思潮的大本营。

林彪治下的军队，是不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军队，我不敢说。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世界上最愚昧的军队。

以《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为标志，林彪将党内的谄媚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二、

这个崭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毛的两个宠信——林彪、江青雨露同沾，且在没翻脸之前，林、江还形成了互吹的默契。为了插手军队，江青放下身段，给林彪当“轿夫”（《邱会作回忆录》，第609页）。林彪心里恨不得一枪毙了江青，可在军队干部会上，却是一片阿谀——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她一方面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体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具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出处同上，第562页）

一方面是林、江互抬轿子，另一方面是党政军高层争先恐后向他们献媚——

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做斗争的一个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1968年3月24日周恩来在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562—563页）

谁能相信，这些肉麻的吹捧出自“人民的好总理”？而“好总理”在讲完了这番话之后，余兴未尽，“还领着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出处同上，第563页）

这种讲话，这类表演，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竟至形成了要讲话就非阿谀拍马不可。随便抄上几段高层领导拍林彪马屁的讲话——

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23—624页）

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胜利的革命事业。（叶剑英讲话。李德、舒云编《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958页）

拥护伟大的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叶剑英讲话。李德、舒云《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978—979页）

这些话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在台上的人都得这么说。讨好昏君以获宠幸，也是当年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深明君臣大义的周恩来谆谆告诫黄吴李邱：“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80页）

邓小平说，文革中，囿于形势，周恩来也说过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这些错误里面，就包括周对毛、林、江的吹捧。以周在党内外的崇高威信，他的吹捧对提升时代的谄谀之风起了大作用。问题是，这个形势是谁造成的呢？

对于林彪来说，要维系他创造的“崭新的阶段”，保住自己吹毛第一名的光荣，他就得在拍马逢迎上不断升级加码。唐德刚所说“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只有用在这个时候才准确（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台北远流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滋味难受，又不得不吹，一直吹到毛说了“讨嫌”。

人们常说，阿谀奉承之徒没有好下场。事实上，这种人的下场各异，终生荣华富贵的大有人在。“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搞吹拍者也有一个遇与不遇的问题。林彪的不幸在于，他没有遇到唐明皇，而是碰到了“始皇帝”。

十三、

怀念毛时代的人们，常常夸赞那时的吏治，以彼时的清廉对比现今的贪渎。颂扬毛的人们，常常拿毛的朴素节俭说事：盖了N年的毛巾被，打了N个补丁的旧衣，一年不吃肉等等。这些人无知于一个基本常识——腐败有种种，拍马逢迎、阿谀取容同样是腐败，而且是比贪污受贿更隐蔽、更可怕的腐败。

谄谀的对象是权力。谁掌权，谁就会得到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谄谀。谄谀是精神性的权力寻租——掌权者付出权力，获取谄谀者的歌功颂德。谄谀者以正直良心为代价，换取权力者赐予的种种好处。毛泽东是当代最大的权力寻租者，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支出权力，得到了上至中央高层，下至黎民百姓的谄谀。林彪有足够的资格提醒那些生活在乌有之乡的人们：早在文革之前，这种腐败就已经在神州大地泛滥成灾了。

谄谀源自人性的趋利避害，源自变态心理和人格缺损。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杜绝谄谀。但是，好制度可以抑制谄谀的病毒，使谄谀之人缺少机会；坏制度则是谄谀病毒的培养基，可以使正直之人走上拍马奉迎之路。

批林批孔使我读了中国通史。由此知道了古代朝廷的派系——外戚、宗室、大臣、太监……清除精神污染时，我突然有所领悟：康生、“四人帮”无非是外戚的变种，毛远新、王海容、迟群、谢静宜、汪东兴不过是宗室的变形；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邓小平等则是大臣的代表。“始皇帝”驾崩，宗室集团与大臣集团联手，打掉了外戚集团。先华后邓，保住了红色江山。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是鬼打墙。呜呼，信矣夫！

2 0 1 1 — 5 — 3 0 修定

□ 原载《记忆》第74期，2011.8.30

~~~~~

【史海钩沉】

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

• 郑彦英 •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天，我在广州空军政治部任创作员，奉命到福建漳州机场，采访广空在漳州机场值班的航空兵团。就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听说广空政治部刘副主任坐专机来了，代表广空领导，看望慰问值班的航空兵团。

我在机关时就知道，刘副主任曾任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所以，听说他来，我的心中自然少不了好奇，当然也有敬畏。虽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但是他是军级干部，我是连级，中间距离太大，从来没有机会接触。

见到他的时候是去食堂吃饭，反倒是飞行团的领导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握握手，点了点头，脸上似乎没有表情，但我还是发现了淡淡的和悦。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和他一起吃饭，住在一个招待所，并且一起散步。我一直想问刘少奇专案组的事情，那时候刘少奇还没有平反，但我不敢贸然开口。有一天散步时，他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是高中，他噢了一声，我说我一直想上大学，但是要部队推荐才行。他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连忙说，那当然，起码得是大学生。刘副主任摇摇头，说恰恰相反，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我问什么框框，他说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我大惊，想说前两条都可以理解，最后一条怎么这样定，但我张开口却没有说出来，心里头的想法，至今也没说给任何人。

既然说开了，刘副主任一边散步一边接着说：我去北京是周总理跟我谈的话，说这个专案是中央文革小组长江青最关心的一个专案，包括我来，都是江青圈定的。周总理让我负责日常工作，并建立各省刘少奇专案组，专案组成员选择条件，和中央专案组一样。之后他讲了一些省份的专案组情况。我听着，心里边翻江倒海的。

第二天吃完晚饭，我依然紧紧跟着刘副主任，想听听关于刘少奇专案组的情况，但是飞行团领导也跟着，刘副主任就没说这个话题。第三天我们散步时，刘副主任才说了一个事件，说当时领导要求，这个专案，要办成全国样本专案，所以所有事情都不能马虎。比如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

其实我还想知道很多，但是刘副主任离开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1993年，河南省拟拍摄《毛泽东在河南》，让我担任制片人，派我去北京找刘少奇之子刘源，让他找中央领导题片名，省领导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将刘源办公室的电话和家里的电话都给我了。刘源担任过我省副省长，我就跑到北京去找了。我到了武警水电指挥部门口，将省委的介绍信给门卫看了，门卫说刘政委没来单位，我想那可能在家，就在门卫值班室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我就说明了来意，她说刘源上午在外面开会，让我下午到刘源办公室找。我说了声谢谢，然后说：“您是……”

她温和地回答，“我是她妈妈。”

噢，这就是王光美！这就是当年为了抄家把她拉出去批斗的王光美，共和国主席夫人！我想到了，但没想到她会这么坦率地告诉我。

下午我在武警水电指挥部见到了刘源政委，他看了信后说他想办法办，并让我向写信的省领导转达问候。我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后，心想，当年办刘少奇专案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

这些事情我原本不想写出来，在肚子里窝到另一个世界。但看到网上一些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帖子，觉得应该把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说出来，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义务。

□ 来源：作者博客 2011-03-28

~~~~~

## 【荒诞年代】

文革最红最红的红歌：《完蛋歌》

• 心里有杆秤 •

某些国人以唱红歌为证明，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人们知道，文革曾流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红歌，照此逻辑，那么中国最红的红歌，当属毛主席语录歌，因为这不仅最红，而且最亲。

毛主席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

史无前例的，毛主席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时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革命派，什么人反革命派，什么人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于是，在国庆节首都天安门广场的庆祝集会游行即毛泽东第4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便开始播出了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2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10月25日，《人民日报》推出了第3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在短短的20多天里，官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毛主席语录歌的热潮。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毛主席语录歌声。毛主席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语录歌的产生，不仅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

“伟大统帅”毛泽东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那么“副统帅”林彪的话便自然成了“次高指示”。除去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当时还派生出了为“林副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

“林副主席语录歌”几乎与“毛主席语录歌”同时出现。在196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时，打头一首就是“林副主席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该报并在《编者按》中说明：“今天本报发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志最近关于学习‘老三篇’的指示”。这应算是第一首由官方推出的“林副主席语录歌”。

此后，为“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不断出现，较为人们熟悉的有《要带着问题学》、《为人民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林彪那段称颂毛泽东“四个伟大”的题词（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被谱成歌曲后，定名为《毛主席万万岁》，还有一首“林副主席语录歌”：“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7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很难从这段话中取出一句或半句来作歌名，只好定名为《毛泽东思想颂歌》。

不知谁从林彪的哪篇“著作”中找出来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像念诵“刀枪不入”之类口诀那样，或高诵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一段语录，

或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

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这首“林副主席语录歌”，谱曲者注明歌唱完后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毛主席语录”与“林彪语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

《完蛋歌》，才是中国最红最红的红歌。看来，今天某些以唱红歌为证明，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中国人，真还有“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 来源：作者博客 2011-04-30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